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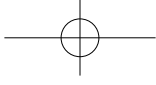
CHAPTER 1

第一章

区域国别学概论

作为一门学问，区域国别学（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是关于一国对于其外部世界学术知识体系的总和。当整个世界被民族国家化之后，在一国国内知识研究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学科体系，对于一国内部问题的研究往往会根据问题的性质归入某一明确的学科之下，比如对于一国经济现象的研究被视为经济学研究，而对于一国之外经济问题的研究则往往不被视为经济学研究，而是将其与某一区域国别联系起来而被称为区域国别学。由于对于一国外部问题的研究往往涵盖了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类、地理等诸多学科，很难被纳入某一学科之下，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则往往被宽泛地称为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尤其以语言文化、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为主要学科支柱。

从其学术使命来看，区域国别学以获得某一区域国别的地方性知识为目标，而并不以获取普遍性知识为目标。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国家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其对于同一区域国别的研究往往有着多样化的解读，带有不同国家的特色和烙印。在多数情况下，区域国别学承担着形形色色的实用化目的，很多成果停留在描述性研究的层次，被批评为缺乏学理研究的基础。区域国别学的学术社群往往与各个学科社群格格不入，且互有批评和优势，当然也各有其生存之道。近代以来，受欧美发达国家殖民主义和海外扩张的影响，区域国别学带有很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从而遭受了不少学者的鞭挞和指责，无论是基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还是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概莫能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到全球大循环中来，也面临着众多全球性问题。各国都纷纷重视推动全球研究背景下的区域国别学，且相互对话和深度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区域国别学社群，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学者和影响巨大的学术成果。毫无疑问，区域国别学已经越来越成为学科发展百花园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第一节 区域国别学的内涵

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是一门学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区域国别学也不例外。受制于特定的国家立场和视角，也受制于不同学科的综合研究，区域国别学往往难以明确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宽泛地讲，凡是一国范围之外的知识建构活动，均可被纳入区域国别学，它既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努力，也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现，甚至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也被纳入其中。然而，相比之下，学界普遍不把自然科学的研究视为区域国别学，倾向于把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但是，对于某一地区地理特征和气候特征的关注往往对于理解该地区的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故而学界在提及区域国别学时也提倡文理交叉、协同攻关。尽管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理解差异，区域国别学更关注某一区域国别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意义，是一种相对意义的研究。不同的参照系则往往具有不同的区域国别学，而且不同国家对某一区域国别的研究彼此之间也存在对话，构成了区域国别学的多维画面。

一、区域国别学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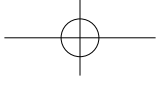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区域国别学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称呼，比如地区研究、区域研究、区域国别学、国际区域学、中国周边学、全球学等。最初，区域国别学来自英文中的“Area Studies”，泛指对西方之外的非西方地区的研究，既有战略上的考虑，也有文化上的内涵。但是，在中文语境中，地区和区域研究范围比较模糊，有国家之下的地区（比如美东地区、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等），也有国家之上的地区（比如东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中东地区、中东欧地区、拉美地区等），但并不特指某一国家之外的区域知识建构，至少并不突出国家的意义。在民族国家时代确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区域都已经实现了国家化，国家成为最具文化和战略意义的地理区域，有着明确的疆域和主权，在国际社会较少争议，故突出国别有利于人们对于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共享知识。尤其是对一些对地区事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来说，以国别（International）为研究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中文语境中，“国别”或“外国”和“区域”或“地区”之类的概念有一定的弹性，范围可大可小，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各界，在不同情境下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有着多重含义，并不一定专指中国以外的知识建构。当下对区域国别学的界定完全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尤其是中国教育部近年来积极推动区域国别学基地所采取的称呼，在英文上被翻译成“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据李晨阳考察，尽管教育部积极推动区域国别学，很多学校和研究机构在使用上仍然存在差异，反映了对不同侧重点的强调。比如，2017年9月20日，清华大学成立国际与地区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将国际放到地区前面以突出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再如，2018年4月12日，北京大学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特意将区域放在国别的前面以突出区域研究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学者

提出了“国际区域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蕴岭研究员)、“中国周边学”(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和“全球学”(暨南大学庄礼伟教授)等概念,分别突出其学科性、周边地区对中国的首要性和全覆盖性等。

在国际学界,区域国别学的理解具有多种含义。2014年,英国政府启动的“优秀研究框架”(the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的区域研究评审委员会在申报指南中将区域国别学定义为:“对世界上所有的区域以及在区域中居住或与之相关的群体的研究。”根据这一定义,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变动的学术领域,涵盖了包括但不限于非洲研究、美国和英语国家研究(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及北美殖民地)、亚洲研究(包括中亚、含中国的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研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研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地区研究,欧洲研究(包括欧盟研究、俄罗斯和东欧研究和后苏联研究),中东研究(包括以色列研究和伊斯兰世界研究)以及这些地区和区域内种族与更广泛世界的互动,包括犹太人、穆斯林和其他移民族群。在方法论上来看,该机构认为对这些区域的历史、语言、文化、文学、宗教、媒体、社会、经济、人文地理、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区域间和全球化研究均属于区域国别学的范畴。美国学者艾伦·坦斯曼(Alan Tansman)对区域国别学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定义,认为区域国别学是一种在跨学科视野下认识、分析、诠释外国文化的事业。戴维·桑顿(David Szanton)认为“区域研究”涵盖了不同领域和研究活动的学术家族,包括高强度的语言学习,用当地语言深入实地研究,密切关注当地的历史、观点、材料和诠释,紧紧依靠详细的观察、测试、阐释、批判、发展基础理论,跨过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界限进行跨学科对话等。很多学者在开展区域国别学的时候,往往会聚焦于一个或者几个相关国家,努力将其与更大的范围(比如所在的大洲)结合起来,获得对该区域国别的整体性认知。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和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认为区域国别学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以地区为主导的区域研究(比如东北亚地区研究);二是以全球化为主导的区域研究(比如不同区域间的跨学科和比较研究);三是以重要问题为主导的区域研究(比如恐怖主义、民主等)。尽管学界对区域国别学的理解各异,但均强调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地域性、整体性、学科性等特点,区别只不过在于各自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

综合国内外学界对区域国别的理解,可以将这一学问的名称确定为区域国别学,它是指对某一域外特定国家/联邦区域、地理区域和文化区域进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典型的区域国别学往往涉及历史、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语言、地理、文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项目。除了特定国家和地区文化研究之外,区域国别学还包括特定地区海外侨民和移民研究。作为一门对域外国别和地区进行的知识建构体系,区域国别学从一开始就是域内和域外区分的地理属性、学理和实践并重的意义属性、人文与社会学科融合的方法属性的统一体。



二、区域国别学的特征

区域国别学具有明显的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特征，本质上是一门交叉学科。坦斯曼强调区域国别学所具有的翻译特征，称区域国别学“是一项通过多学科棱镜来寻求认知、分析和解释外部文化的事业”^①。尽管不少学者怀揣追求科学化的梦想，但区域国别的多样性和彼此差异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研究更多属于不同文化转译的解释学，解释为什么彼此之间在同一议题上存在着迥然不同的看法和规律，以及为什么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必须尊重和包容国别和地区的多样性等。因此，重视区域国别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作为是一个世界大国的标配，也是走上世界舞台的“必修课”。一个国家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战略布局的体现，反之，区域国别学也能促进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

（一）跨地域研究

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国家对其域外知识的建构，本质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域外知识探求的学术意图和战略意图，既有从一国出发经略疆土的地缘战略意图，也有不同地域之间友好交往的外交意图，跨地域性是区域国别学的首要特征。因此，区域国别学确立了明确的观察角度和观察方位，不仅确立了明确的地理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也设定了“谁研究”的基本视角和基本观察方位。

“谁研究”为区域国别学设定了出发点和判断标准，也赋予其特殊的研究偏好。区域国别学体现着某种国家战略意图，致力于满足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战略需要。不管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还是以特定地理和文化区域为单位，区域国别学体现着研究者的偏好和意图。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是不同的，欧洲的非洲研究与中国的非洲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不同视角的区域国别学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借此比较不同国家对特定区域国别的战略走向。因此，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行走在世界田野的经世致用之学，这一学问重视田野调查，重视文献考证，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国家的域外知识体系，增进一个国家对方外世界的理解和认知。

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上不同区域国别已经日益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从不同视角观察的特定国别和区域研究越来越重合，除了仍然存在各自视角的差异外，其重叠部分越来越多，区域国别学正在被纳入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之中，国家治理与区域治理本身也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跨文化研究

区域国别学在本质上重在进行一种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一研究致力于解决局外人对区域国别社会和文化相关假定、意义、结构、动力的问题，同时也为其创造了

^① Tansman A. Japanese Studies: The Intangible Act of Translation. In Szanton D L,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22.

一个通过比较研究来扩展反思自身文化和社会理解的机会。文化是打开区域国别学大门的真正钥匙,通过比较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明的渠道,区域国别学找到了通往域外世界的康庄大道。显然,从意义属性来看,区域国别学既是一项致力于解释特定区域国别现象的学理研究,也是一个国家推动与特定国别和区域关系互动的实践研究。

区域国别学承担着学理研究和战略研究的双重使命,设定了“为什么研究”的意义路线。在区域国别学社群中,有的学者倾向于以特定区域国别为案例,检验所谓的普遍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进而发展和修正理论。有的学者则倾向于锁定特定区域国别进行精雕细琢的调查研究,进而发现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世界。还有的学者从纯粹实用的角度出发,为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等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更多进行政策性、实践性和操作性问题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满足现实实践的发展需要。不管采取哪一种研究路线,均可被视为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内容,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不同研究路线会百川入海,共同汇入区域国别学的汪洋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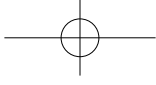
因此,决定区域国别学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采取文学、历史、哲学的先验人文主义视角,也不在于是否贯彻社会科学的经验路线,而在于找到阐释区域国别文化意义的纹理脉络。举例来说,中国的拉美研究应该是什么?和美国的拉美研究有什么不同?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期待获得什么样的收获?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拉美地区的客观现实,更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因此,区域国别学是一面镜子,通过观照区域国别学,间接镜鉴自身前进的方向。

(三) 跨学科研究

区域国别学简而言之就是对其他国家、域外地区做研究。无论是早期英法等殖民国家的“东方学”“埃及学”“斯拉夫学”之类的研究,还是冷战期间美苏推动的区域研究,其共同特征就是跨学科性: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而是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努力,比如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博物学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即费正清中心,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做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学术基地,其成果涉及许多领域,“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指地理对象,即某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①。因此,如果要尝试建立新学科的话,区域国别学应该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学科,多学科研究对于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任何单一的学科都无法真正抓住和解释另一个社会和文化真谛的全部画面。

从区域国别学关注的方法论来看,它既可以从人文学科视角对特定区域国别进行

^① 钱乘旦:《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载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编委会:《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一辑),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文化意义的研究，也可以从社会科学视角对其进行科学意义的研究。最初，欧洲国家在殖民主义扩张时期开展的研究，多采取人文学科的视角，内容由一些传教士、旅行者、商人的个人经历和一些思想家对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构成。比如一些欧洲国家在研究中国时关注分析中国的语言和历史文献，形成了汉学的研究传统，就属于对中国采取的人文学科视角的研究，参加研究的学者更多出身于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背景。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对东方主义的分析，也是美欧等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开展人文研究传统的集中体现。二战以后，尽管区域国别学的人文传统仍然保持稳定发展，但在美国区域研究浪潮的推动下，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背景出身的学者开始大规模卷入区域国别学中，社会科学视角的研究蔚然成风，提出了众多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和思想观点，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研究、东亚研究、苏联研究、非洲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影响力也最大。相比之下，以中东研究、南亚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仍然不得不面对印地语、阿拉伯语等语言研究以及宗教研究，人文学科的研究仍然根深蒂固。条条大路通罗马。区域国别学在学科和方法论上是开放的，只要有助于增进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理解，一切学科、方法和技术路线都是可以的。

三、区域国别学的功能

要而言之，作为一门由域外世界知识建构的学问，区域国别学承担了为某一特定区域国别生产学术知识、为本国提供咨询建议和塑造政府政策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区域国别学属于一项学术事业，它通过积极参与对某一区域国别的学术研究，锁定一系列重要学理问题，采取多学科综合的方法，对复杂地区社会现象做出科学解释和文化阐释，构建和完善关于该地区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也属于一项社会事业，它通过为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提供关于某一区域国别的咨询建议，帮助其解决与该地区发展关系时遇到的各类问题，发挥咨政建言的作用。因此，按照其所服务领域和对象划分，区域国别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知识建构功能

知识建构是区域国别学的首要功能。所谓知识建构，是指人们通过累积相关的经验材料，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对这些经验材料进行加工整理，进而识别出内在的、本质的和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并以此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思想工具。区域国别学能够帮助人们准确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取和积累必要的知识，成为人们应对和处理各种问题和挑战的强大工具。

最初，区域国别学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尚未成为一门学科之前，它就作为一种知识建构的事业在实践中逐步确立，古今中外皆有大量游侠、方士、僧侣、商贾、官员跨境远游，获取新知识和开拓新视野。在中国，先秦时期有徐福东渡，汉朝有张骞出使西域，东晋法显和唐朝玄奘赴天竺取经，历朝历代留下了《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真腊风土记》《诸蕃志》《岛夷志略》《异域录》《东西洋考》《职方外记》《坤輿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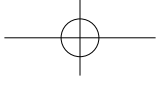
《西洋列国考》《艺文考》等大量关于域外知识的文献，一直到近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所有这些文献构成了中国早期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对于中国对外关系史、航海史、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等综合性多学科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古代希腊和罗马也都有大量关于异域文化和风土民情的相关记述。尤其是欧洲关于“埃及学”“东方学”“斯拉夫学”等研究成果，均属于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宝藏，大大丰富了各自对域外地区的理解，组成了各自域外知识的体系。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苏联都热衷于推动区域研究或区域学，依托大学、研究机构建立起了形式不一且相对独立的学科系所、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形成了比较研究、国际研究、区域研究等学科方向，持续性推进区域国别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同时，有的区域国别学还提出了若干理论模型，推动了学科基础的发展。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大量新理论，例如基于拉丁美洲研究的依附理论、现代化理论、官僚威权主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格尔兹的“剧场国家”等。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中，亚非拉等一批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建立新兴国家，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为修正和发展现有理论或建立新的理论提供可能性。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53 年 12 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建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研究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政治，出版了多部政治发展研究系列丛书，很多都成为了政治学领域中的名著，推动了政治学学科和理论的发展。

（二）文化阐释功能

文化阐释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功能。所谓文化阐释，是指将某一区域国别的文化进行重新编码、转译、解释，进而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体系所能理解的形态。文化阐释的根本任务是了解和理解其他区域国别的独特性，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区域国别学为女性研究、性别研究、少数族裔研究、族群研究、文化研究以及一系列文化研究项目奠定了制度基础，大量以文化对象为主要内容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有了快速的发展。区域国别学与文化研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汇集成对域外研究的强大力量。

近代以来，随着整个世界步入民族国家时代，原本相互隔绝的大陆和海洋被联结为一个整体，过去的地方性、局部性的多样文化在全球互联互通进程中频繁接触碰撞，如何将各自文化差异在不同区域国别中进行阐释和转译，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任务。区域国别学是一门针对某一特定国别和区域的外部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过程。无论选择从人文学科的视角出发，还是选择走社会科学的路线，区域国别学所做的一切工作在本质上都致力于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解释、阐释和转译，进而让适用于某一区域国别的独特文化现象易于被其他国别和地区所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国别学本身就是跨国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历史、国际关系、比较政治、世界经济、比较文化研究等学科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都属于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



（三）咨政建言功能

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开展咨政建言，是区域国别学的内在使命，也是其承担的重要功能。《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真正准确理解你的敌人和对手，才能更有机会赢得优势和胜利。区域国别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一些国家之所以不遗余力地热衷于推动区域国别学，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无论是美国的区域研究，还是苏联的区域学，都具有服务冷战战略需要的使命，一些从事区域国别学的专家学者，也往往是政府决策会议和领导人决策咨询常来常往的座上宾。

当然，区域国别学与政府政策之间还是不完全相同的。与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保持适当的距离，是区域国别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完全与政府政策研究卷在一起，往往会受制于政治考虑或者意识形态约束，给区域国别学发展造成制约和束缚。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批评美国的区域国别学与美国战略需要和政府决策走得太近，沦为政府御用决策的婢女和一场“了解对手”的政治运动，甚至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工具。随着冷战的结束，政府对区域国别学的支持力度大大下降，甚至有人认为区域国别学已经过时了，大大削弱了区域国别学的科学性和自身发展能力。近年来，中国国际化进程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对区域国别学也提出了新的战略需要，如何平衡知识建构功能和咨政建言功能，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社会服务功能

除了对政府的咨政建言之外，开展对企业和社会各界的社会服务，也是区域国别学的一项重要功能。最初，区域国别学主要为国家战略需要服务，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行为体开始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活跃角色。与国家和政府一样，这些经济和社会行为体在开展国际化经营和参与国际事务中也具有大量的咨询服务需求，如何为它们提供智力支持和社会服务，也是区域国别学的一项重要职能。

为经济和社会行为体提供社会服务也是区域国别学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渠道。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20世纪以来智库，尤其是企业型智库、媒体型智库的兴起，就是区域国别学社会服务职能增强的一个集中体现。为了满足企业扩大国际化经营和媒体全球传播的需要，很多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人员和团队通过为企业、媒体和智库服务，不仅获得大量研究经费的支持而设立了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研究项目和课题，而且也通过参与其国际活动而获得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和亲身参与实践的机会，这对于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助力。二战以来，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为代表的一些机构，对美国的区域国别学给予巨大的资金支持；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也设立了大量的情报分析和研究团队，依托智库设立了大量区域国别学项目，在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经济和社会组织现实需求以及推动区域国别学科专业发展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加快,中国海外资产已经超过 7 万亿美元,每年出入境人数已经超过 1.7 亿人次,中国大学、智库、媒体和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在客观上也对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同时,通过加强区域国别学,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也是区域国别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使命。

第二节 区域国别学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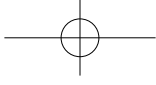
与其他学科发展一样,区域国别学也有自己的学科发展史。从学科发展史来看,区域国别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年轻的学问。通过考察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成长史,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

一、区域国别学溯源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其一些分支可以追溯到古代关于世界史、外国语言与文化等研究。在中国,战国时代只有一个空泛的“九州”观念和渺茫的“四方”地域观念,战国后才产生了具体的“九州”“四极”说,“大世界说”和“海外三十六国”的记载。^①以古代中国、罗马帝国、莫卧儿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等为代表的大帝国均设有外国语言、外国文化和史学机构,但其对区域国别的研究均具有我族中心主义的特征,不认为其他地区的知识是一种文明。

在欧洲,关于罗马研究和日耳曼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以前。比如英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东方研究,根据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网站的数据,该学院的希伯来语教学、犹太研究和阿拉伯研究已经有 400 年的历史。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赛克勒图书馆及其他图书馆雄厚的馆藏文献是从未间断历史传承的结果。近代以来,关于外国语言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步伐加快,一些旅行家、传教士、商人在世界各地行走,推动了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最早到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根据其见闻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公元 13 世纪他经行地中海、欧亚大陆和游历中国的见闻,讲述了令西方世界震惊的一个美丽神话,这是人类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著作,它向整个欧洲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殖民主义向海外大肆扩张的进程,耶稣会开始派出一大批传教士赴海外传教,中国就是当时耶稣会海外传教的重点地区之一,比较有名的传教士有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理雅各等,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写下了一些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作品。比如葡萄牙人托雷多通博的《国家档案馆中有关葡萄牙人海航与征服的文献》、亨利·玉尔的《古代中国见闻录》、巴罗斯的《亚细亚》、马礼逊的《中国大观》、苏扎的《葡属亚细亚》、布莱克斯的《中国与远东》、布莱尔的《菲律宾群岛》、克拉维约的《克拉维约东使记》、洛奈罗德的《荷

^① 顾颉刚、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载《禹贡》,1936(3)、(4)。



兰人在中国》、揆一的《不可忽视的福摩萨》、南怀仁的《鞑靼旅行记》、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弗·克·阿尔谢尼耶夫的《在乌苏里的莽林里》、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所有这些游记见闻性质和具有区域史意义的作品，对于欧洲世界史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总体来看，尽管区域国别学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但一直到 20 世纪初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区域国别学从属于语言、文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而且在形式上非常贴近大学里与语言相关的核心学术标准。以 1088 年博洛尼亚大学建立为标志，欧洲大学陆续形成了大学学科化的传统，区域国别学也从治国理政的宫廷之学逐渐转向知识建构的教授之学，但区域国别学一直没有从语言文化和历史研究中独立出来。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简称《风俗论》）一书，被学术界一致认为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步真正的世界史著作，叙述了自查理曼时代到路易十五时代的世界各国历史，目的是要说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当代文明的”，具有了世界史的宏观视野，也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提出的研究“总体史”或“全球史”的口号，实际上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时代编史传统的复兴。比如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5 至 18 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皆是如此。不过，这一世界史的传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世界上的区域国别均是被放在欧洲中心论的探照灯下进行审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中心论受到挑战。斯宾格勒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以生物生长过程的概念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毁灭的过程。汤因比继承和发扬了斯宾格勒的思想并向前推进，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已知的 20 多种文明，汤因比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同时，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的建立也进入了作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汤因比还广泛地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接触、碰撞和融合，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区域国别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过去，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创建却是 20 世纪以来的事情，其学科化与传统帝国的崩溃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世界大战和冷战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与早期服务帝国及其对外殖民需要的人文交流路线不同，20 世纪以来的区域国别学逐渐走向了人文学科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交映成辉的新轨道。

二、帝国崩溃、民族国家兴起与区域国别学

反观历史，区域国别学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兴起，实质上是帝国崩溃与大量民族国家革命运动的产物。18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运动的扩张，以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印加帝国等为代表的传统帝国崩溃，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等在海外建立起了大小不一的殖民帝国，也推动了海外殖民地的研究发展。到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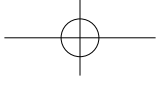
世纪初,殖民帝国之间争夺海外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演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殖民帝国的力量,导致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革命、民族独立运动和政治变革的浪潮。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国家兴起,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加强区域国别学。从发展重点来看,欧洲各国的区域国别学从最开始就依赖于外国语言研究。1936年,英国斯拉夫研究院理事会主席恩斯洛(Onslow)伯爵就强调加强学校俄语教学规模,以改变西欧人不了解东欧人的现状,更好地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英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俄语教学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作为教授欧洲语言专门机构的泰勒学院(The Taylor Institution)成立于1835年,但俄语教育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日益上升才真正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因为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俄国的未来比德国更具不确定性,俄国对外将更加开放。因此,英国要想利用好俄国开放的机遇,就必须“全面地研究俄国,研究它的语言、解剖它的社会、了解它民众的性格、知道它的地理方位、掌握它的经济状况和经济能力”^①。和斯拉夫研究类似,英国很快也启动了非洲研究、亚洲研究、拉美研究等其他区域研究。作为一个重要标志,英国在1915年前后建立了一系列区域国别学机构,引领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化进程。

伦敦大学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学院是英国第一家关于区域国别的教学、科研机构,其前身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1915年建立的斯拉夫系。1915年10月19日马萨里克教授(Thomas Garrigue Masaryk)(后为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在国王学院发表了题为“欧洲危机中的小国问题”(The Problem of Small Nations in the European Crisis)的演讲,并宣布出资成立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学院(SSEES),该学院的主要任务是讲授并研究俄罗斯语言和文学。1932年,学院成为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直属研究机构,1999年,学院决定与伦敦大学学院合并,正式加入伦敦大学学院(UCL)。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学院是英国最大的东欧及斯拉夫语系语言中心,该院重视语言教学,认为语言是民族文化沟通学习的重要桥梁,提供18种语言学习课程,包括俄语、捷克语、波兰语等。该院是伦敦大学学院最具影响力的核心研究机构,致力于世界范围内地缘政治和经济区域合作领域的研究。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是英国唯一一所专门研究亚洲、非洲、近东和中东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享誉世界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机构。1916年,伦敦大学成立东方研究院,其后因为增加了非洲研究方面的教学和研究项目而改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范围涉及亚洲、非洲、近东和中东的艺术和人文、语言和文化以及法律与社会科学。迄今为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世界杰出、欧洲顶级的亚洲和非洲研究中心之一,是欧洲制定亚洲与非洲相关战略的重要智囊机构,是全世界研究东方以及非洲问题拥有学者最多的机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亚洲、非洲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和东方语言学的研究在全英排名前五,仅

^① Leathes S M.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to Enquire Into the Position of Modern Language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18.



次于牛津、剑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其中,《中国研究》由创办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所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和 1992 年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 (China Institute) 主办,重点皆放在中国现状的研究上,他们与英国政府相关部门保持联系,出版“当代中国研究丛刊”,国际知名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就是他们的重要出版物。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是一家以国际问题研究为主的智库机构,在区域国别学上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一战结束以后,1919 年英国和美国代表参加巴黎和会,英国政府官员莱昂内尔·柯蒂斯 (Lionel George Curtis) 倡导成立一个外交事务研究所来研究国际问题以防止未来的战争。因此,1920 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别名查塔姆研究所 (Chatham Hous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是一家位于伦敦的非营利、非官方的智库组织,也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查塔姆研究所既不从属于政府部门,也不接受政府拨款,属于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智库,主要围绕能源、环境与资源治理、国际经济、国际安全、地区研究和国际法等领域进行研究,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影响,奠定了其在全球国际事务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项目包括非洲项目 (Africa Programme)、美洲项目 (US and the Americas Programme)、亚太项目 (Asia-Pacific Programme)、欧洲项目 (Europe Programme)、全球经济项目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e Programme)、国际法项目 (International Law Programme)、中东和北非项目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gramme)、国际安全问题项目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me)、俄罗斯与欧亚项目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me)、可持续发展项目 (Sustainability Accelerator) 等。该所每年举行 100 多场国际会议,推动对国际事务重大发展及其对策的讨论,对全球、区域和国别问题进行独立分析和探讨,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特别是提供新的思路 and 想法。其中最为成功的两个品牌是伦敦会议和查塔姆研究所奖,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享有较高赞誉的《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和《今日世界》(*The World Today*) 等杂志,即由查塔姆研究所编辑出版。该研究所每年发布的报告、书籍和其他研究成果,更是英国政府部门制定决策的重要参考来源。

在其他一些高等教育机构,也建立起了区域国别学机构,比如牛津大学的跨学科区域研究学院 (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Area Studies) 和圣安东尼奥学院 (St Antony's College), 聚集了一大批区域国别学的学者和研究生培养项目。牛津大学的全球和区域研究学院 (Oxford's School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区域国别学学院,设立了包括非洲、中国、拉美、中东、日本、俄罗斯和东欧、南亚等区域研究项目。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研究学者共同体,研究者从全球化和发展大局出发,研究地区、国家、区域和全球之间的互动,以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家,也建立了诸如巴黎政治学院 (Science Po)、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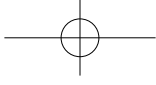
Relations)、布鲁盖尔(Bruegel)研究所、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等从事区域国别学的有影响力的机构,致力于分析非洲、亚洲、拉美、中东的政治、社会 and 经济发展议题以及全球性议题。比如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是一家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总部设在汉堡。它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开展前沿比较研究,分析这些地区发展产生的系统性影响并将其与全球重大问题相关联。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议是构成研究所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研究所拥有德国最大的区域和比较区域研究非大学信息中心。随着这些研究机构和项目的成立,区域国别学得以在各国落地生根,开枝展叶,逐步成长为重要的学科方向。

三、冷战与美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

最初,美国的区域国别学一直受到欧洲学术传统的影响。在19世纪时期,美国就有类似于欧洲“古典学”的区域国别学,主要是基于基督教会海外传教、商人和旅行家提供的非职业化域外知识的绵长传统,更关注古代典籍和古代问题、海外语言与文学等。1919年,詹姆斯·亨利·布雷亚斯(James Henry Breast)在洛克菲勒的资助下在芝加哥大学创立了东方研究所,致力于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研究,但对其他地区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浮光掠影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这一区域国别学欧洲传统,一大批从事外国语言学习和文化研究的学者被征召入伍,成为重要的军事参谋人员,为二战后美国区域国别学的爆发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区域研究是政府需求直接催生的。面对美苏冷战对峙局面,美国急需加强对共产主义阵营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分析,在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和大学共同推动下,从1943年开始,美国的区域国别学有了迅猛发展。作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中枢组织,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协同其他学术组织、基金会和高等教育机构,在美国发起构造区域研究的学术运动,目标是建立美国的区域国别社会科学学术体系。通过推动召开年会、开展专题讨论和推出专题报告,该理事会不断呼吁要实现区域研究的制度化,主张单独建立一个新的地区研究委员会,并为未来发展制定计划。最终,经过多方努力,建立了世界地区委员会和全国地区研究奖学金计划。同时,为加强和学科的对话,1954年建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为区域国别研究注入了新动力。总体来看,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区域国别学实现了空间上的全覆盖,也实现了跨学科的整合,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毫无疑问,冷战对于美国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知识体系受到美国全球战略、意识形态和资金来源等多方面的影响,几乎可以说美国区域国别学的兴衰都与冷战相关。

首先,政府是美国区域国别学最强大的支持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常青藤联盟大学的专家成为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情报分析人员,并帮助培训海外军事人员和战后占领部队。二战后,一些人加入美国政府安全和情报机构,大部分回归大学重启教职。为加强区域国别学的发展,美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诸如“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等,加强欧洲的战后重建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民主进程,以保护



美国的国家利益。1946年,美国启动了富布莱特计划。福特基金会也成为美国区域国别学项目的主导角色。20世纪50年代,福特基金会建立的海外区域学者项目是美国第一个大规模支持区域研究的项目,用于支持对某一国家或区域进行为期两年的跨学科和语言培训,再加上资助两年的海外学位研究,从1951年到1972年,该项目支持了2 050个博士生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1961年,富布莱特项目中用于支持“共同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项目得以扩展,支持与区域国别相关的1 000多个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研究和教学项目。同样,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人文基金会也设立了类似的资助区域国别的研究项目。1972年后,福特基金会转而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一起推动跨学科区域研究委员会,在此后的30多年内支持了3 000多名博士后学者的研究,还通过其他基金资助了2 800名博士后区域研究。1957年的《国防教育法》、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提供了专门的资金用于支持125所大学建设国家资源中心项目、外语和区域研究项目。所有这些支持计划,都对美国区域国别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次,基金会在美国区域国别学中也功不可没。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卡内基基金会(The Carnegie Corporation)召集了一系列会议达成了重要共识,认为美国在国际知识上存在赤字,必须加大对国际研究的投入,支持从事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学者是服务美国国家需要的首要选择。不过,在与会者中间存在着一个核心的争论,一方认为应该突破西方的模型,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合作一起推进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历史研究的相关进展;另一方认为社会科学家应该发展普遍化理论来解释不同地区的共同发展规律。受到此种争论的影响,前者发展为区域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后者则成为现代化理论的热烈拥趸。一些私人基金会比如梅隆基金会(The Mellon Foundation)、亨利·卢斯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等也对推动区域国别学提供了大量支持。福特基金会还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用以支持工作坊、研讨会和出版项目,提供了1 200万美元直接支持15所美国研究型大学建设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中心。据统计,从1951年到1966年,福特基金会共计提供2 700万美元用于支持区域国别学相关的研究、培训和相关项目,资助形式涵盖了支持教师、学生奖学金、外语学习和课程、图书馆和研究基金等。

此外,大学是美国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力量。在政府倡导和基金会资助下,大学建立起了大量区域国别机构。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建立区域研究机构。哈佛大学是最早开展区域研究的大学之一,设有72种古代和现代语言课程,近20个跨学科区域研究组织。在过去的50多年里,美国已有127个外国语言及国别和区域研究国家资源中心,培养了约10万名具有语言技能和区域专业知识的博士和30万名硕士,拥有9大区域研究协会共有近2万名学者。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建构最具规模的国家。

与美国的区域国别学类似,冷战背景下的苏联、欧洲、日本等其他国家也大力推动区域国别学。在苏联,依托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莫斯科友谊大学、莫

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等建立了一大批从事区域国别教学研究的学院、学系和研究所,奠定了俄罗斯国外区域学和俄罗斯区域学两个方向的学科基础。欧洲国家也围绕其前殖民地国家设置了大量的区域国别学中心和研究项目。澳大利亚的大学也积极建设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研究和培训中心,但对中东、非洲和拉美的研究项目投入较少。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长期注重亚非区域研究,日本国内排名前十的高校均设有区域研究或国际研究的中心或机构。日本东京的外国语研究大学也聚焦区域国别学计划。此外,印度的尼赫鲁大学是印度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机构。

四、冷战终结与区域国别学的重新定向

随着冷战的终结,区域国别学步入了一个重新定向的全球区域研究新阶段,区域国别学开始越来越重视普遍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区域研究在美国逐渐衰弱,但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却迅速上升。

在中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对区域国别学的需求大大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部推动依托高校建立了美国、东南亚、东北亚、俄罗斯、中东、欧洲、南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华侨华人等9个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5年1月,教育部出台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2017年下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试行)》,推动建立区域国别学培育基地和备案研究中心,并要求建立实体化组织架构。截至2021年9月,已经在全国181所高校建立了42家培育基地和402家备案研究中心,共计444家。其中,181所大学主要集中在四类学校:“985”院校24所,建立了107个基地或中心;外语类院校18所,建立了130个基地或中心;师范类院校40所,建立了70个基地或中心;边疆地区综合院校19所,建立了40个基地或中心。从事区域国别学的人员总数已经超过1万人。在2020年的区域国别基地评估当中,48家基地或中心获得了教育部区域国别学高水平建设单位称号。中国区域国别学正在步入一个大发展的新时代。

在俄罗斯,自2000年起,区域学作为一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专业方向被列入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专业目录,并逐渐形成了国外区域学和俄罗斯区域学两个方向。2007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Putin)倡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得到各成员国一致赞同。据介绍,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有区域学、生态学、能源学、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5个专业方向,主要面向培养硕士研究生。其中,区域学方向的中方项目院校已于2011年开始招收首批硕士研究生,并根据双边合作协议,于2013年上半年首次实现了与俄罗斯合作伙伴院校的学生互换交流。

除此之外,在印度、巴西、南非、土耳其、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联酋、卡塔尔、伊朗等国家,区域国别学发展也非常迅猛,虽然各自关注的主题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发展规模 and 专业化程度参差不齐,但都对区域国别学表现出来浓厚的兴趣,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深刻地改变着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地图。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浪潮背景下,区域国别学方兴未艾,其所反映出的时代趋势是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复苏。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反之,越是全球化,越是地方化。

对于一个拥有 70 多亿人口规模的世界来说，所有地区不可能齐头并进，更不可能实现整齐划一。相反，多样性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的常态，世界的统一性是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当然，多样性也离不开世界的统一性。区域国别学是世界与生俱来的学问，政治和战略因素可能会影响区域国别学的兴衰，但无法取消区域国别学，也无法长期维持源于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文化霸权地位，这就是区域国别学的基本定位。

思 考 题

1. 请结合研究实际，谈谈区域国别学应如何平衡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2. 如何看待全球化时代背景与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内在张力？
3. 请结合自身实际，谈谈对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认识和展望。